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SHANXI WENXUE PIPINGSHUXI

主编 / 张 平 张明旺

多声部的文学交响

王春林◎著

Duoshengbu de Wenxuejiaoxiang

纠结：文化冲突中的人性困境透视 思想智慧烛照下的历史景观 中国本土小说传统的创造性“复活” 传统宗法制的一曲文化挽歌 乡村女性的精神谱系之一种 新时期30年山西小说艺术形态分析 赵树理、农民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 试论“家庭苦情”系列对“伤痕文学”的艺术超越 理解蒋韵小说的几个关键词 王祥夫小说的底层关怀 有效推进底层叙事的内在化进程 李锐传略 略论张平为“老百姓写作”的文学观 一位思想者的精神独白 理性沉思的力量 灾难之后的痛苦沉思 至情，至性，至文 方言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运用 我们今天该怎样叙述抗战的故事 如何深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激进现代性”的“历史化”进程 纠结：文化冲突中的人性困境透视 思想智慧烛照下的历史景观 中国本土小说传统的创造性“复活” 传统宗法制的一曲文化挽歌 乡村女性的精神谱系之一种 新时期30年山西小说艺术形态分析 赵树理、农民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 试论“家庭苦情”系列对“伤痕文学”的艺术超越 理解蒋韵小说的几个关键词 王祥夫小说的底层关怀 有效推进底层叙事的内在化进程 李锐传略 略论张平为“老百姓写作”的文学观 一位思想者的精神独白 理性沉思的力量 灾难之后的痛苦沉思 至情，至性，至文 方言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运用 我们今天该怎样叙述抗战的故事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性”的“历史化”进程 纠结：文化冲突中的人性困境透视 思想智慧烛照下的历史景观 中国本土小说传统的创造性“复活” 传统宗法制的一曲文化挽歌 乡村女性的精神谱系之一种 新时期30年山西小说艺术形态分析 赵树理、农民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 试论“家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SHANXI WENXUE PINGSHUXI

主编 / 张 平 张明旺

1538798

多声部的文学交响

王春林◎著

Duoshengbu de Wenxuejiaoxiang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声部的文学交响 / 王春林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2.8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 张平, 张明旺主编)

ISBN 978-7-5378-3725-5

I. ①多…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文集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6073 号

书 名 多声部的文学交响

著 者 王春林

责任编辑 陈学清

封面设计 阎宏睿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营销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8200905 转 802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荣博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725-5

定 价 26.80 元

山西批评家实力的集中展示

——序《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张 平

山西是文学大省,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历史上出过许多成就卓著的大作家,也出过不少大评论家,比如唐代司空图,就写过文学评论经典《二十四诗品》等作品。近现代山西文学史上,同样有过一些影响很大的评论家,比如李健吾等。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我省创作的繁荣兴盛,文学评论发挥了引导和推动创作的重要作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批评家》杂志为核心,凝聚和培养出一支在全国评论界令人瞩目的评论家队伍,成为“晋军崛起”中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些评论家经过二十多年的磨砺,知识积累越来越丰富,理论素养越来越厚实,评论视野越来越广阔,写作成就越来越突出。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省作家协会决定推出这套《山西文学批评书系》,以展示我省文学评论家的实力。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入选的八位中青年评论家段崇轩、傅书华、苏春生、陈坪、杨占平、侯文宜、杜学文、王春林(以年龄长幼为序),都是当下山西文坛的骨干力量,都还在职,担负着宣传、文学、教育、科研等方面的领导或教书育人工作,并且都已经从事文学评论二三十年,出版和发表过许多专著和评论文章。这次,他们每个人都非常认真地遴选出近些年来发表的文章,结集成书,代表了他们各人的学术水平和评论风格,应当说,集中体现了山西批评家的整体成就,是山西文学界值得关注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对于进一步促进全省、乃至全国文学创作健康发展,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自己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偶尔也写点评论文字;不过,却一直重视和

关注文学评论,有不少评论家是我的老师或朋友,在我的写作过程中,都给予过难忘的帮助,这次《山西文学批评书系》中的八位评论家,多数都写过关于我创作的文章。因此,我对评论家的创造性文学劳动非常尊重。人们常说,评论和创作是文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健康的高水平的文学评论,就难以有创作的不断提升。评论家通过对作家与作品的解剖、分析、判断,通过对与作家作品相关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研究和探讨,实质上是参与到了整个文学秩序中,并构成强有力的一环。

就国内目前的文学评论状况而言,我认为,伴随着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的演变,评论也已趋向多元化。文学评论作为文学这个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变化;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方式,与社会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评论也不例外。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时代逐渐转变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价值观念、文化素养,也随之发生了遽变,文学创作所反映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同时,创作本身也越来越多样化。这样,文学评论自然不能仍旧墨守成规,在评判作品的价值时,在分析作家的艺术风格时,在研究创作倾向时,都不再像以往那样单一了。另一方面,文学评论家自身的理论基础、观察问题的角度、写作的方式等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衡量作家、作品的标准也越来越新颖、宽泛。应当说,文学评论总体上是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了。这个特点,我们从这套《山西文学批评书系》中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理想的文学批评当然是既要有“作协派批评”的生动活泼和尖锐犀利,又要有“学院派批评”的理论深度和旁征博引。但是,正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文学批评也难以达到这种理想化程度。我个人的看法是,每一种形式的批评,都有自身的优势,同时也有不同程度的局限,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优势,克服局限,切实做到有理有据,把握住所评作家或作品的核心问题,真正起到指导创作的作用,评论的价值也就体

现出来了。不管是“作协派批评”，还是“学院派批评”，或者别的什么批评，都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不过是表达方法方式不同而已。其实，这些批评方式，都有着一种互补的成分。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成败，或者一部作品的水平高低，既需要“作协派批评”的生动活泼和尖锐犀利，也需要“学院派批评”的理论深度和旁征博引，还需要别的批评从另外角度进行透视。这样，对于所评作家或作品乃至整个文学，才是有益的。

关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就我所接触的作家而言，绝大多数对批评家是友善、尊重和理解的，他们认为批评和创作是相互联系的，都是文学的组成部分，没有批评的创作是不完善的；对于批评家关于创作的看法，有些作家确实受到了启示，即使有些看法不一定符合作家的创作意愿，也能够理解，因为从评论家的角度看作品，总是与作家有一定的不同。当然，也有少数作家认为批评家是依附于作家而生存的，轻视批评家的作用，这只能说这些作家还没有真正理解了批评的意义和作用，随着他们阅历的增多，会逐渐改变这种态度的。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的面世，我觉得对于八位评论家的写作，是一个有价值的小结，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同时，对于整个山西文学评论的发展，也有诸多的启示意义。希望全省的老中青评论家都能够不断表现出各自的独立性，建立各自的风格特点，积极参与到全省和全国文学创作中，发出我们的声音，展示我们的实力，为进一步推动山西文学创作大繁荣大发展，发挥特殊作用。

2012年4月16日

（张平：山西省副省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聚 焦

1

纠结:文化冲突中的人性困境透视

——论李锐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 / 2

思想智慧烛照下的历史景观

——评林鹏长篇历史小说《咸阳宫》 / 17

中国本土小说传统的创造性“复活”

——评成一长篇小说《茶道青红》 / 33

传统宗法制的一曲文化挽歌

——略评葛水平长篇小说《裸地》 / 44

乡村女性的精神谱系之一种

——评李骏虎长篇小说《母系氏家》 / 48

透 视

59

新时期30年山西小说艺术形态分析 / 60

赵树理、农民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 / 72

试论“家庭苦情”系列对“伤痕文学”的艺术超越

——重读张平1980年代的“家庭苦情小说”系列 / 80

理解蒋韵小说的几个关键词

——兼谈中篇小说《心中的树》 / 96

王祥夫小说的底层关怀 / 101

有效推进底层叙事的内在化进程

——读王祥夫小说近作有感 / 112

扫描

119

李锐传略 / 120

略论张平为“老百姓写作”的文学观 / 137

一位思想者的精神独白

——评林鹏读书随笔集《平坦札》 / 145

理性沉思的力量

——评赵瑜长篇报告文学《火车头震荡》 / 155

灾难之后的痛苦沉思

——读赵瑜等著报告文学《王家岭的诉说》 / 161

至情 至性 至文

——读毛守仁散文集《石在》有感 / 165

思索

173

方言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运用 / 174

我们今天该怎样叙述抗战的故事

——新世纪热播抗战题材电视连续剧的文学性探讨 / 202

如何深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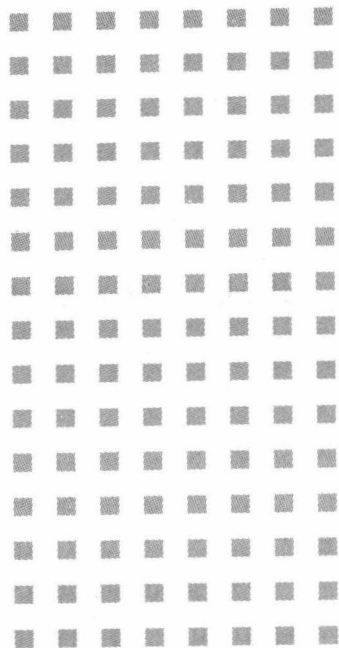
——以李洁非的《典型文案》为中心 / 220

“激进现代性”的“历史化”进程

——评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 236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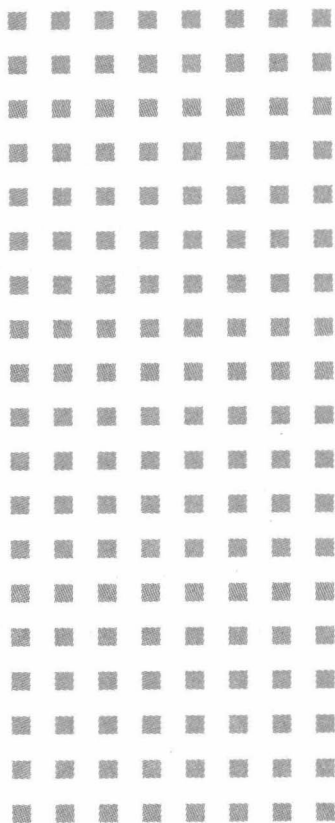
251



多声部的文学交响

DUOSHENGBUDEWENXUEJIAOXIANG

◎ ——— 聚 焦 ———



纠结：文化冲突中的人性困境透视

——论李锐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

在我自己的印象定位中，李锐从来就是一位类似于鲁迅先生一样的以思想性见长的小说家。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当我们强调李锐以思想性见长的时候，绝不意味着其他的作家就不具备思想性。只不过与那些更多以感受性以日常生活的描写见长的作家，比如说贾平凹，比如说莫言，这样的作家相比较，李锐更多地以思想的深刻取胜而已。比如说，就在这部《张马丁的第八天》^①中，李锐也曾经拿出一些篇幅描写故事的发生地天母河一带的民俗风情场景。我们注意到，在小说的第二章“娘娘庙”这个部分，李锐曾经刻意地描写展示过天母河地区大旱时老百姓祈雨的情形。虽然李锐并无明确的表示，但一种艺术的直觉告诉我，李锐的这种描写肯定是要努力地实现长篇小说所谓描写再现生活的丰富性，力争使自己的小说具有更加浓郁的日常生活气息。然而，只有在认真地读过这些场景描写之后，我们才不得不承认，李锐确实不是一位以日常生活的描摹展示见长的小说家。虽然不能说李锐的描写存在什么问题，但作家的描写显得有些干巴粗硬，却又是无法否认的一种阅读感受。各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把同样的场景描写置换到贾平凹或者莫言笔下，将会是多么的绘声绘色、多么的生动鲜活，就会明白，严格地说起来，李锐真的不是一个以日常生活的描写见长的作家。不同的作家具有不同的思想艺术个性，实际上，也正是这些不同个性作家的同时存在，极大地丰富着我们当下时代的文学景观。正所谓李白杜甫，各有所长，姚黄魏紫，各有所擅。面对着诸如贾平凹、莫言、李锐这样一些艺术个性鲜明独异的作家，我们绝不能秉持某种僵化的标准，做一种简单粗暴的是非臧否。以一种理性的宽容姿态，接纳更多艺术个性迥异不

^①载《收获》杂志2011年第4期。

同的作家,方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价值立场。

读完《张马丁的第八天》这部凝聚着李锐多年思想积累的长篇小说,浮现在我心头最直接最强烈的一种感受就是纠结。对,没问题,就是纠结。除了纠结一词,其他的语词真的无法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我这样一种复杂的阅读体验。面对着强烈文化对峙冲突中裸露呈现出来的那样一种真实人性困境,我们真的一时无法作出自己的评判和选择。如果把《张马丁的第八天》放置在李锐的创作谱系中考察,则其中所传达出的那样一种对于文化身份问题的深入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对作家早在《人间——重述白蛇传》中就已经明确提出过的所谓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自觉延续:“在对于传统的‘白蛇传’故事进行了大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之后,李锐、蒋韵为《人间》设定的基本思想题旨已经演变成了对于‘文化认同’或者‘身份认同’命题深刻的思考与表达。对于这一点,李锐在‘代序’中同样有着清晰的理性表达:‘身份认同的困境对精神的煎熬和这煎熬对于困境的加深;人对于所有异类近乎本能的迫害和排斥,并又在排斥和迫害中放大了扭曲的本能——这,成为我们当下重述的理念支架。’”^①在当时,我认为,李锐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一种深入的对于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真切表达,与他自己在“文革”中一种特别的人生经验存在着隐秘的内在联系。李锐、蒋韵之所以要把所谓的“文化认同”或“身份认同”问题设定为自己“重述的理念支架”,其根本的原因,正在于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李锐自己在“文革”中有过这样一种由“红五类”而变身为“黑五类”的极为惨痛的人生经验。

现在看起来,尽管说李锐自己“文革”期间的特定生存经验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作家关于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但这却很显然并不是促使李锐思考表达这一问题的唯一原因。除了“文革”经验之外,李锐近年来的出国旅行经验,以及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中西文化冲突问题的持续关注,无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影响着李锐的小说创作。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次,就是写作《人间——重述白蛇传》之前,李锐偕同妻子蒋韵在美国爱荷华写作中心那样一次较长时段的出国经历。关于这次的出国体验,我最起码曾经两次聆听过蒋韵的讲述。而蒋韵讲述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只有真正地置身于异国他乡的时候,自己才强烈地意识

^①王春林《“身份认同”与生命悲情》,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

到了“我是谁”这样一种亘古追问的现实意义。非常明显,蒋韵此处关于“我是谁”的追问,所强烈凸显出的,实际上正是一种鲜明的文化身份困惑。如此一种文化身份的困惑与茫然,不可能出现在老死不相往来的相对封闭隔绝的古代社会,只可能形成于人群交往越来越密切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势不可挡的现代社会。蒋韵在这里所讲述的,当然不会是她自己一个人的体会。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做是李锐与蒋韵一种共同的文化感受和体验。与此同时,需要引起我们充分关注的,还有李锐长期以来对于中西文化冲突问题的持续性思考。用李锐自己习惯性的话语来表达,也就是所谓的“双向煎熬”：“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是为了煮自己的肉。’新文化运动中很强烈的主流观点,就是全盘反传统全面西化,包括最后选择了共产主义理论进行革命,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别国里拿来的真理的火种。但是,‘文化大革命’让我们看见真理的大火终于把中国烧成了一片废墟。自己的传统没有了,从别人那里找来的真理又变成了一场浩劫。所以说中国人是处在这样一个两面的困境。”^①正因为有着如此一种深切的体悟,所以,作为一位以写作为终身使命的作家,李锐念兹在兹的就是怎样才能够有效地建立“现代汉语主体性”的问题。认真地琢磨品味一下,就不难发现,实际上,李锐所一再重复强调的重建“现代汉语主体性”的问题,也正是一个在中西文化冲突尖锐激烈发生的时候,如何重建中国本土文化主体性的问题。

就这样,李锐本人在“文革”期间的惨痛人生遭际、他直接的一种出国体验以及长期以来对于中西文化冲突问题的深度思考,三者缠绕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李锐在自己的一系列小说作品中关注思考表达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根本原因。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李锐和蒋韵早在《人间——重述白蛇传》中就已经借助于白蛇的民间传说明确地展开了关于文化身份问题的思考,但是,白蛇的民间传说毕竟也只是一种遥远的民间传说,作家在其中对于文化身份问题的思考多多少少有点显得虚无缥缈的话,那么,到了这部直接描摹展示历史生活的《张马丁的第八天》中,作家的思考就终于有了扎实的依托。不仅如此,根据我自己多年来对于李锐小说的追踪阅读研究,如果说作家1980年代初出道时写作的短篇小说《厚土》系列以其思想内涵的凝重与艺术形式的精致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中具有经典意味的小说

^①《痛苦的双向煎熬——李锐大阪演讲》,见“99读书人论坛”。

作品,那么,在经过了很长一个时期的探索实验努力之后,这部无疑凝结着作家自己多年思想积累的《张马丁的第八天》,显然也已经成为了李锐另外一部十分重要的优秀小说作品。我们注意到,在与访谈者的对话中,李锐拒绝承认这部小说是一部“终结之作”：“不是‘终结之作’，是‘开始之作’。”^①虽然李锐的坚持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虽然我们也承认李锐小说的思想艺术历程肯定还会有新的发展,这部《张马丁的第八天》当然不会成为李锐的盖棺论定之作,但是,最起码,从阶段性的意义上,说这部作品是李锐小说写作历程中一部具有阶段性总结意义的长篇小说,是一贯主张“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的作家李锐一次成功的小说艺术实践,却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

要想准确地理解把握李锐这部小说的深刻思想内涵,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到李锐对于故事时间的特别设定。小说的故事时间起始于天石村的农民在光绪二十五年夏天因为老天久旱不雨所举行的一次恶祈。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场恶祈的举行才为传教士与天石村民们之间尖锐冲突的爆发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契机。等到小说行将结束的时候,当那场浩浩荡荡的大洪水降临到天石村的时候,时间已经是第二年,也即光绪二十六年的夏天了。光绪二十五年,正好是公元1899年,光绪二十六年,则是公元1900年。因为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教会势力的大量进入而最终导致大规模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也正兴盛于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这个时间点,距离满清帝制的最后覆亡,距离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所剩也不过只有十一年的时间了。更进一步地从公元纪年的意义上说,这个时间点,也正是所谓的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始,是所谓的世纪之交。从纵向的时间轴来看,这个时间点,正是古老的中国迫于外部力量的巨大存在而向现代的中国根本转型的关键时刻。从横向的时间轴来看,在凭借着所谓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打开国门的同时,以传教士为突出代表的西方异质文化也已经大规模地涌入古老的中华大地。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尖锐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依然成为了一种无法回避的文化事实。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李锐所特别选定的这个时间点,正是所谓古今中外文化一个非常关键的交汇处。由此可见,选择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切入历史,充分地展示了作者对于文化冲突中人性困境的观察与省思,首先凸显出的,就是李锐一种特别的艺术

①李锐、续小强《“煎熬”的历史观：〈张马丁的第八天〉》，载《名作欣赏》2011年第10期。

智慧。

小说的叙事焦点,乃是来自于西方的传教士与恪守中华本土文化的天母河地区天石村村民之间的文化冲突。西方传教士的代表人物,是那位把上帝福音的传播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还要更加重要的莱高维诺主教。这是一位已经在遥远的中国传教多年,并且也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投入到中国传教事业中的意大利传教士。对于一心从事福音传播的莱高维诺主教而言,他坚信:“中国已经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也早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信心再封闭自己。东方那样一块毫无尊严的辽阔蛮荒之地,正需要主的光芒去照亮。”为此,他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要为自己的传教事业早日择定一位合适的具有献身精神的继任者做接班人。为此,他不惜千里迢迢,专程返回意大利,结果就是和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乔万尼(乔万尼的中文名字就是张马丁)不期而遇。自从遇到意志坚强的张马丁,莱高维诺主教就认定,这个孩子将会成为自己传教事业最理想不过的继承者。其二,与继承者的择定相比较,莱高维诺主教另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在天母河地区如何设法拆掉娘娘庙修建一座天主教堂,因为“自从做了天母河地区的主教之后,莱高维诺神甫就发现,天石村的娘娘庙简直就是他迈不过去的一座高山”。小说中最激烈的矛盾冲突,实际上也正是紧紧地围绕着娘娘庙与天主教堂的拆与建而渐次展开的。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充分地意识到,所谓的娘娘庙与天主教堂这两种物事具有的强烈象征意义。如果说天主教堂可以被看做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象征,那么,专门供奉女娲的娘娘庙,则毫无疑问应该被看做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就必须注意到李锐在设定故事发生地时的良苦用心所在。故事主要发生地天母河地区的由来,与中国古老传说中的女娲娘娘存在着密切关系。“天母河先向南,再向东,浩浩荡荡直奔大海。在两河相聚的岔口上坐落着一块巨大无比的红石头,相传是太初之时,女娲娘娘炼五色石补天遗留下的,被她随手丢在了太行脚下的荒原上。”“又相传,女娲娘娘……就在天母河边日夜不停抟泥做人。”很显然,此地之所以成为天母河地区,其根本原因恐怕正在于与女娲有关的这样一些古老传说。必须注意到,女娲补天造人行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如果说,上帝在西方一向被视为创造了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的话,那么,在中华大地,能够被看做造物主的,就只能是

女娲娘娘了。这样看来,李锐之所以要专门设计传播福音心切的莱高维诺主教到为女娲建有娘娘庙的天母河地区传教,其根本意图正是在一种象征的意义上凸显出中西文化对抗的激烈程度。

实际上,以莱高维诺主教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渗透和进入,果然激起了天母河地区民众的激烈对抗。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人物,就是身为天石村迎神会会首的张天赐。所谓迎神会,其所迎者,自然就是女娲娘娘。身为迎神会会首,天然地就比一般人多出了一份责任。对于张天赐来说,无论如何都得保住那座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娘娘庙:“我是不能如了洋鬼子的意,不能叫他们拆了咱们的娘娘庙,咱们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庙,是全村老少乡亲的宝贝,是全天母河的宝贝,凭他妈啥叫洋鬼子给拆喽呢……”虽然说张天赐没有什么文化,不可能从理论上弄明白什么叫做中华文明,什么叫做异质文化,但他却朴素本能地维护着自家祖先世代代留下来的东西。为了维护祖先留下来的娘娘庙,张天赐甚至于不惜献出自己的身家性命。

莱高维诺主教与张天赐之间必然要发生的尖锐冲突,果然在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夏天,激烈地爆发了。由于天气异常,这一年的天母河地区久旱不雨。在其他各种祈雨的手段均告无效的情况之下,天石村村民决定举行一次恶祈。然而,正是在这次恶祈的过程中,祈雨的民众与教民们之间发生了强烈的对峙,并由此而进一步引发了激烈的暴力对抗。但也正是在这次不期而至的暴力对抗过程中,为了保护莱高维诺主教不受伤害,勇敢的乔万尼(张马丁)被鹅卵石击中额头不幸身亡。乔万尼(张马丁)的意外身亡,为早就企图拆毁娘娘庙用天主教堂取而代之的莱高维诺主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毫无商量余地要求张天赐在自己的生命与娘娘庙之间作出艰难痛苦的选择。要么保全自家的性命,要么彻底舍弃娘娘庙。没想到的是,这张天赐果然算得上一条铁打的汉子,他宁愿舍弃自家的生命,也要拼死保护已经在天母河地区存在了几千年之久的娘娘庙。面对莱高维诺主教的强大压力,县令孙孚宸万般无奈,最后只好屈从于天主教会的意志,被迫在天石村行刑,处死了一心一意要舍命保庙的铮铮铁汉张天赐。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张天赐已经偿还了乔万尼(张马丁)的命,那么这故事自然也就该告一段落了。然而,真正是文似看山不喜平,李锐小说的峰回路转之

处在于,乔万尼(张马丁)的死,居然是假死,他后来居然又死而复生了。从整部长篇小说的结构来说,乔万尼(张马丁)的死而复活,乃是最重要的“文眼”所在。这就如同下围棋一般,做“活眼”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只有有了“活眼”,整盘围棋才能够被真正地盘活。乔万尼(张马丁)的死而复活,实际上意味着《张马丁的第八天》的故事情节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捩。有了这一人物的死而复活,李锐的这部作品才具有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所应具备的故事情节足够的丰富性,才能够带给读者一种强烈突出的峰回路转之感。本来,一个已经被宣布“死亡”的人的复活本身,肯定会让人喜出望外。但是,乔万尼(张马丁)的死而复活,在惊喜之外,带给这个世界的,却更多的是一种一团乱麻一般的纠结感。对了,没有问题,就是纠结。只有紧紧地抓住这“纠结”二字,我们才可能对小说中人物的人性世界作出合理的剖析,才能够更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李锐这部小说深切的思想内涵。首先,那位已经被斩首的张天赐的心态是纠结的。虽然说张天赐舍命保庙的行为绝对称得上是一种英雄壮举,但是,我们却完全能够推想得出,在张天赐的内心深处,围绕着到底应该舍命,还是应该保庙?到底应该保庙,还是应该舍庙?肯定有过一番痛苦的矛盾挣扎。不管怎么说,生命属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哪怕为了一个崇高的使命,也没有人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其次,那位以传播福音为根本使命的莱高维诺主教,他的心态也同样难以摆脱纠结,虽然认真地说起来,他的纠结前后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乔万尼(张马丁)死而复活之前,面对着为了保护自己而不幸身亡的乔万尼(张马丁),莱高维诺主教的纠结在于为什么死去的是自己择定的继承人而不是自己:“孩子……孩子……为什么是你替我为主来献身呢……为什么……为什么是你用了为我准备的棺材……”正因为莱高维诺主教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所以,他的这种纠结,显然是真诚的。到了乔万尼(张马丁)复活之后,莱高维诺主教的纠结,自然也就转移了方向。到了这个时候,他的纠结,恐怕就在于到底应该怎样面对乔万尼(张马丁)死而复活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到底应该直面乔万尼(张马丁)的死而复生,还是应该为了更好地传播所谓的福音,瞒天过海,彻底隐瞒乔万尼(张马丁)复活的事实?这样的一种矛盾冲突,显然构成了莱高维诺主教后一个阶段的内心纠结。虽然说莱高维诺主教最终作出的是瞒天过海的决定,但这样一种纠结过程的存在,却是无法被否认的。

其实,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内心纠结现象。比如说,那位县令孙孚宸。面对着强力对峙的天主教会与天石村村民,这位县令欲和稀泥抹平矛盾而不得。以至于身为朝廷命官的他,置身于风雨飘摇的乱世,到最后,也只能发出无奈的慨叹:“如今是洋人惹不得,教民惹不得,教会惹不得,乡间社团惹不得,颗粒无收的饥民更是惹不得。眼睁睁看见马上就要洪水滔天,可又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任何人能挡住这没顶之灾。孙孚宸不由得慨叹只有生在这样的乱世,才会知道什么叫生不逢时,什么叫家国不保,什么叫度日如年,真正情何以堪!”这一段叙事话语,一方面生动形象地道出了当时社会重重矛盾叠加的真实状况,另一方面却也活画出了孙孚宸本人内心的纠结情形。然而,认真地说起来,却又何止是孙孚宸呢?甚至于连同李锐小说中的一些次要人物,也都处于内心纠结的状态之中。比如,那位最终出卖了自家主人的瘸腿老三。眼看着主人家的残疾闺女莲儿,就要因为实在找不下合适的婆家而嫁给自己;眼看着得到了莲儿,也就得到了主人家的所有家产;没想到半路上却杀出了个程咬金,没想到莲儿的表哥葫芦却突然出现在了莲儿家。葫芦的出现,当然就彻底打破了瘸腿老三的如意美梦。于是,瘸腿老三内心里怨恨交加恼羞成怒,就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事情。所以,瘸腿老三的纠结,就在于如意算盘的无法实现。正因为早已怀恨在心,因此,一旦有了机会,一旦义和团运动发生,瘸腿老三的借机报复,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一种人性的恶,就这样被催生表现出来,并且得到了一种相当有力的艺术呈示。

然而,真正被内心所无法释怀的纠结所紧紧缠绕的两个人物形象,恐怕还应该是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乔万尼(张马丁)与张王氏。先来看乔万尼(张马丁)。一个人却拥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名字,李锐如此一种特别的命名方式,就已经透露出了这个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分裂性。对于真诚地信仰着天主的乔万尼(张马丁)来说,最大的痛苦不在于自己肉身的覆灭消失。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可以不顾身家性命地去救护莱高维诺主教。在小说中,最令乔万尼(张马丁)困惑和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死而复活。因为他的死而复活,不仅把自己所一向崇仰的莱高维诺主教推到了一种极其尴尬的处境之中,更是把他自己也推到了一种简直就是无法选择的两难困境之中。尤其是面对着莱高维诺主教已经无法更改的让他继续“以死的形式”存在下去的决定,乔万尼(张马丁)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痛苦。他最无